

## 清乾嘉時期中朝士人之學術交誼：以《韓客巾衍集》之西傳清朝及其關涉之士人交往為中心\*

孫衛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清(1636–1911)與朝鮮王朝(1392–1910)建立宗藩關係的初期，儘管兩國保持著政治與經濟上的往來，但是在學術文化上，清朝對朝鮮的影響並不大，因為朝鮮長期以來有一種尊明反清的心態，在思想文化觀念上刻意拒斥清朝的影響。<sup>1</sup>但是隨著清朝不斷採取德化施恩政策，對朝鮮屢施特恩，朝鮮一點點地改變對清朝的看法。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朝鮮在對清朝的認同上，有了實質性的改變。<sup>2</sup>乾隆三十年(1765)冬，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1731–1783)隨同其叔父洪億來京，他一反以往朝鮮燕行士人不與清朝學人交往的先例，積極尋找機會與清朝學人交往，後來終於與浙江舉子嚴誠(1732–1767)、潘庭筠(1742–?)、陸飛(1719–?)等結交，並且成為摯友，從而打破了朝鮮士人與清人不相來往的態勢。洪大容將彼此交往的經過及唱和詩文編入《湛軒燕記》之中，在朝鮮國內產生很大的反響。<sup>3</sup>以後隨同燕

---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研究(04CGJ005)」與南開大學亞洲中心項目「清乾嘉學派之東傳朝鮮及其影響」的階段性成果。

<sup>1</sup> 參見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sup>2</sup> 參見陳尚勝(主編)：《朝鮮王朝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另參見陳尚勝：〈論17–19世紀朝鮮王朝的清朝觀的演變〉，《韓國學報》(臺北)，第16期(2000年)，頁87–102；孫衛國：〈試論清對朝鮮宗藩政策的演變及其效果〉，《東方文化》(香港)，第41卷第1期(2006年)，頁91–122。

<sup>3</sup> 參見孫衛國：〈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以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的交往為中心〉，載楊龍(主編)：《東北亞社會經濟文化與區域合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51–71。

行使前往北京的朝鮮士人踏著洪大容的足跡，積極與清朝學人交往，從此開啟了清代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的新時期。<sup>4</sup>

如果說朝鮮士人受到洪大容《湛軒燕記》的鼓舞開始熱衷與清朝學人交往，十一年後《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則是一批朝鮮青年詩人對於清朝學人的試探，得到清朝學人的積極反響之後，更增強了他們與清朝學人交往的興趣。<sup>5</sup>他們中的三位以後多次來到北京，積極與清朝學人往來，回到朝鮮後，一反以往「尊周派」拒斥清朝的態度，發起向清朝學習，倡導「北學」，成為朝鮮北學派的主力幹將，此後掀起了朝鮮士人與清朝學人交往的高潮。<sup>6</sup>本文選取朝鮮《韓客巾衍集》的西傳以及由此而開啟清朝士人李調元(1734–1802)、潘庭筠與朝鮮士人柳琴、朴齊家(1750–1805)、李德懋(1741–1793)、柳得恭(1748–1807)、李書九(1754–1825)的交往，透過具體事例的分析來體察中朝學人間的關係與詩文、學術間的交流，從而更深入地了解中朝學術文化的關係，並進一步透視朝鮮北學派產生的背景。

<sup>4</sup> 對於清代文化之東傳朝鮮，現在最重要的著作是日本學者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的《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此書提及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的西來，但並未展開論述，也未詳論《韓客巾衍集》之西傳與影響。該書以金正喜為中心，詳論他與清代學人的交遊及其相關的書籍與學術的往來問題。另參見張存武：〈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載所著《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304–81。此文對清代中朝學人間的交往有詳細的探討。

<sup>5</sup> 對於《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及其在中朝交往中的影響，中韓學者已發表過幾篇論文，主要有韓國朴現圭：〈韓國的《四家詩》與清朝李調元的《雨村詩話》〉，《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87–92；延邊大學金柄珉：〈《韓客巾衍集》與清代文人李調元、潘庭筠的文學批評〉，《外國文學》2001年第6期，頁67–72；金柄珉：〈朝鮮詩人朴齊家與清代文壇〉，《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6期，頁100–104；金柄珉：〈域外視覺：論朝鮮詩人朴齊家的清代文化觀——以《燕京雜絕》的分析為中心〉，《東疆學刊》2003年第3期，頁1–7；朴現圭：〈中國刊行的朝鮮柳得恭的詩文集〉，《東方漢文學》(韓國首爾)，第15輯(1999年)，頁261–74；朴現圭：〈中國刊行的後四家著書物總覽〉，《韓國漢文學研究》(韓國首爾)，第24輯(2001年)，頁273–92。這幾篇論文皆是從文學與藝術的影響上來考察的，或多或少涉及《韓客巾衍集》，對於因為這部書的西傳而給中朝學者帶來的交往歷程以及雙方思想上的認同則幾乎未曾涉獵，本文希望補苴這個缺漏。

<sup>6</sup> 韓國學者對於「北學派」的研究非常之多，著作主要有柳本學的《燕岩一派北學思想研究》(漢城：一志社，1995年)，該書從朝鮮王朝內部的政治與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去探究其發生、發展的原因、歷程、思想與影響。北學派這批學者大多被冠以實學派的名義，從實學的角度研究甚多，對於這批學者與清代學者間的交往則注意不夠。

### 《韓客巾衍集》之西傳清朝

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鮮國王英祖(李昉，1694–1776，1724–1776在位)過世，正祖(李祘，1752–1800，1777–1800在位)繼位，清朝當即派使臣前往冊封。十一月，朝鮮派遣一行使臣前往清朝謝恩，以李潑為正使，禮曹判書徐浩修(1736–1799)為副使，吳大益為書狀官。<sup>7</sup>在徐浩修的隨行人員中，有位名叫柳琴的文官，他除了輔佐徐浩修外，還承擔一件重要使命，那就是受朝鮮四位青年詩人之託，將他抄錄的四家詩《韓客巾衍集》送給清朝有關詩人評點。

柳琴，字彈素，號幾何。抵達北京以後，他就四處打聽，終於獲悉當時著名詩人李調元的住處。李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內閣中書舍人、國子監學政、考功員外郎、廣東學政等官。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柳琴往訪李調元。當時李調元正閒居在家，甚覺無聊，不速之客突然來訪，甚覺意外。他記其經過說：

今年春正，偶以心疾，閉門攝靜，謝絕來客，不窺戶外者十有五日，又嬾不作詩，遂無一事。每日暮臥，聞轆轤車聲，人語喧闐天都，皆都人士女蹋歌鬧戲，爭看火橋星樹來也。愈思避之，偶有剝啄聲。啟之，則一秀士，丰神朗潤，眉如長松，眼爛爛若崑下電，頭戴笠子，衣道衣，不似中國人。問之，則目瞪口呆不解一語。因以筆代言，始知為朝鮮來中國賀聖天子元朝副使禮曹判書徐浩修所差幕官來求詩集。姓柳名琴，字彈素，以別號幾何主人者也。為言向於書肆中見余《皇華集》，竊慕著述當不止此，故以來。余驟聞之驚，既而喜。驚則以其衣冠言貌迥異中華，若不見近；喜則喜吾聖天子文教遠被，雖屬國亦好文詞，而竊歎箕疇麥秀之遺風，猶有存也。所恠者，鄙人懶不讀書，雖間有所著，亦如蟬鳴蟲咽，應時序耳。然亦過而不留，不知何以獲播于東國諸君子之耳也。延談之餘，因探懷出其《巾衍集》，則為李懋官、柳冷齋、朴楚亭、李薑山四家之詩，而為彈素所選訂者，乞余批定。余既細閱之，而乃益歎詩學之未亡也。<sup>8</sup>

<sup>7</sup> 關於這一次使行情況，在林基中主編的《燕行錄全集》(漢城：東國大學出版社，2001年)中，收錄了一份著者未詳的用古韓文寫就的《燕行錄》，筆者難以通讀，只得從略。可參見《燕行錄全集》第67、68冊。

<sup>8</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韓客巾衍集序〉，載所著《楚亭全書》下冊，收入李佑成(編)：《棲碧外史海外搜佚本》(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92年)，頁184–86；又見柳琴(抄輯)：《韓客巾衍集》前(未注明頁碼)。二者幾乎完全一致，只有個別字稍有不同。

李調元自己亦覺奇怪，柳琴何以會找到他，原來他是在琉璃廠書肆中讀過調元所著《粵東皇華集》，有所感悟而來。<sup>9</sup>《粵東皇華集》四卷，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調元出任廣東副主考時，沿途所作的詩歌集，乾隆四十一年剛剛刊行。李調元「素以詩文名世，意者聲稱籍甚，達於天聽」，<sup>10</sup>可見，當時李調元詩名正盛，乾隆皇帝都有所耳聞。當時《粵東皇華集》正在琉璃廠熱賣，柳琴很容易就得到此書，讀後相當佩服。副使徐浩修對於李調元亦有所聞，想必亦是從《粵東皇華集》中知道李調元其人，遂命柳琴「來求詩集」。柳琴正中下懷，故而冒昧前來。柳琴負著雙重使命，有備而來。他懷揣著《韓客巾衍集》，實際上帶著朝鮮當時四位青年詩人的厚望，正如李德懋所言：「去年冬，友人柳彈素齋《韓客巾衍集》入燕京也。不佞輩日屈指，待其歸來，不知遇何狀名士，以評以序。心焉懸懸，無以為喻。」這四位詩人乃是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李書九，當時他們都只有二、三十歲，四人過從甚密，關係甚好，但是不為朝鮮世人所知。李德懋自言：「不佞輩四人，好古讀書，時有著述，而不入時眼。性嗜韜晦，名不出里閭，晨夕過從，聊以相晤而已。」<sup>11</sup>他們四人自視甚高，苦於不為世俗所容、不為時人所知，故而由柳得恭的叔父柳琴抄錄他們四人的詩歌，集成一冊，帶往北京，看看是否能夠得到清朝詩人的認同與肯定。他們將滿腔的希望寄託在柳琴的身上，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洪大容的故事，對於洪大容能夠結識清朝三位儒生，並有如此深厚的交情，甚覺羨慕，並且滿懷希望。

<sup>9</sup> 事實上，朝鮮人對於《皇華集》一書的書名是十分熟悉的，因為自代宗景泰元年（1450）倪謙出使以後，凡明朝派翰林學士等文臣出使朝鮮，朝鮮都會以朝中最重要的文臣陪同，中朝官員詩賦唱和不絕，明朝使臣回國以後，朝鮮就會將唱和詩文編訂成冊，取名《皇華集》。柳琴之所以找李調元，與這一書名或許不無關係。當然李調元的書與朝鮮並無關係，而是他赴廣東時，沿途所作的詩歌。對於柳琴與李調元相識的經過，李德懋《清脾錄》（朝鮮王朝正祖年間鈔本）卷四有不同的記載，其言：「丁酉（1777）春，柳琴彈素隨謝恩使入燕，彈素，奇士也。欲一交天下文章博洽之士，嘗於端門外，見羹堂儀容甚閒雅，直持其襟請交。遂畫磚書其姓名及字羹堂，一見投契，稱其名字之甚奇，彈素屢造其室，諄諄善接人呈露心，素有長者風。」（原書未著頁碼）想必這是彈素告知他的，不過從李調元的序中看，在柳琴造訪之前，他們並未見過面，李德懋的故事想必有杜撰的成份。有中國學者把柳琴來請李調元寫序，看成是李調元的詩名已經遠播朝鮮的證據，實際上這是一種想像。在此之前，朝鮮詩壇並不了解李調元的情況。此次作序以後，李調元就為朝鮮詩壇所知，可以說詩名遠播東國了。參見羅煥章（主編）、陳紅、杜莉（注釋）：《李調元詩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前言〉。

<sup>10</sup> 程晉芳：〈粵東皇華集序〉，載李調元：《粵東皇華集》，嘉慶十四年（1809）重刊《函海》本，頁二上。

<sup>11</sup>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本（漢城：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編刊，2001年），卷一九〈李雨邨調元〉，頁266。

柳琴見到李調元，奉上一冊《韓客巾衍集》，並囑咐題序和加以評點。在此之前，李調元並不了解朝鮮詩壇的情況，他只是看到這個鈔本，才猛然感覺朝鮮詩風之可貴、詩人成就之高，令人激賞。其論之曰：

余既細閱之，而乃益歎詩學之未亡也。夫詩之失古久矣。唐人之作，其聲中正和平，去漢魏未遠。迨宋元而降，而庶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淫，燕女者溺，趨數者煩，敖辟者喬，由是被之。聲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窄，而弇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有明諸人自言不讀秦以後書，稍稍振起矣，而優孟之誚所不免焉。今觀四家之詩，沉雄者其才，鏗鏘者其節，渾浩者其氣，鄭重者其詞，有一類于前之所譏者乎？<sup>12</sup>

在李調元看來，中國詩歌自宋朝以後就失去了古風，而今見朝鮮四家之詩，古風猶存，其精神乃為之一振，因而對於諸家詩也就大加褒揚。柳琴還特別提到，能否讓他找到潘庭筠，也給以評點。潘庭筠乃是李調元好友，次日，李調元即邀請潘庭筠來訪，出示此書，並囑咐他也作序並評點。

潘庭筠，字蘭公，號秋廬（亦曰字德園，號蘭公）。家居杭州城大街三元坊北首水巷口。乾隆三十一年（1766），嚴誠、潘庭筠進京參加會試時，與洪大容、金平仲相識，並成為摯友。當年，儘管會試失敗，但他們已經聲名遠播，朝鮮士人對他們皆仰慕不已，故而此次柳琴特別希望潘庭筠也能評點《韓客巾衍集》。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庭筠中正榜，三十六年（1771）五月由內閣中書入直。潘庭筠與李調元交誼甚厚，讀到《韓客巾衍集》，也稱頌不已，乃撰序曰：

東方君子之國，聲明文物與華略同，固聖朝文教之遠，亦箕聖以疇範開基，麥秀之遺音，至今猶有存焉者也。憶余丙戌春，獲交洪湛軒〔大容〕、金養虛〔平仲〕兩先生，軟塵寓屋，筆談甚歡。湛軒篤信程朱之學，躬行實踐，不欲以詩鳴。養虛之詩清遠閑放，往往可傳，其胸次亦磊落不群。判別以來，畢生無再見之期，並息耗未通者數載矣。藏於中心，惟增悵歎而已。昨於李吏部雨邨齋頭，得讀柳君彈素所錄海東四家之詩，多刻畫景物，攄寫襟抱，妍妙可喜之作，諷誦數四，不忍釋手。余雖未悉四人之生平，而因詩以想其為人，大抵皆高曠恬淡之士也。國多君子，豈不然哉！柳君又屬吏部，丐余評定此卷。余詩學踈蕪，未足為雞林之重，而惟是天涯舊雨，悵觸於懷，益有不能已於言者，即以此序四人之詩可歟？又湛軒嘗寄余其弟葆光詩一卷，諸

<sup>12</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韓客巾衍集序〉，頁186-87；又見《韓客巾衍集》前。二者幾乎完全一致，只有個別字稍有不同。

體並工，不在四人之下，而柳君未之及，豈未識其人歟？抑仕宦出處與四人者有異歟？余告柳君歸而合葆光與養虛之作，都為一集，為東方竹溪之六逸，不亦可乎？並寄語湛軒，以余言為何如也？<sup>13</sup>

潘庭筠評價此詩集，認為「多刻畫景物，摭寫襟抱，妍妙可喜之作」，同時，深深寄託懷思故友洪大容、金平仲的情感。因為他對於此詩集的背景不甚了解，所以懷疑為何沒有錄入金平仲與洪葆光之詩。

《韓客巾衍集》竟然能同時得到李調元與潘庭筠之序及評點，柳琴自然十分高興。《韓客巾衍集》放在李調元家應該有數日，柳琴前往李調元家也不止一次，經過這樣幾次往來，李調元對於柳琴有很好的印象。他說：「彈素，好奇之士也。酷嗜琴書，尤精于天文、勾股之學。其於詩應鄙而不為，而觀其所選訂如此，其學問之宏深，有非可管窺而蠡測者矣。」因而把其詩集《看雲樓集》交託柳琴帶給徐浩修，「以不辜其求，而並為評驚四家之詩，以重其請」。<sup>14</sup>從潘庭筠所寫的序言看，潘庭筠也見過柳琴，並囑咐其重新編輯詩集，另外再加入金平仲與洪葆光之詩。柳琴在朝鮮歷史上並無甚麼地位，但是卻完成了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為以後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與清朝士人的交往搭起了一座橋樑。也可以說，他催生了朝鮮「北學派」的形成。

因為《韓客巾衍集》，李調元與柳琴結成了朋友，而且往來很密切。李調元的《童山詩集》中收錄了幾首給柳琴的詩，其中一首名為〈幾何主人歌〉，詩曰：

幾何主人身姓柳，自言樂浪少知友。謁來隨使到中華，獨與余逢開笑口。以指劃地琉璃東，衣冠雖異文字同。試酌新年椒柏酒，頗覺唾咳生清風。胸蟠萬卷羅星宿，落筆霏霏如屑玉。可憐握手意無窮，落日催過西山角。二月春城花亂飛，天津冰泮黃華肥。如此風光欲歸去，薊門柳色空依依。幾何子，歸何速，人生最苦天一方，那堪見面情初熟；幾何子，歸何遲，家有小阮正相憶，唱和還應勝此時。<sup>15</sup>

可見他們相識以後，曾經共同飲酒暢談，詩文唱和。柳琴要回國之時，李調元心有不捨。有詩曰：「漫言皮裏有陽秋，時抱虞卿著述愁。誰把詩名傳海外，《看雲樓集》客來求。」<sup>16</sup>這首詩應該是寫給徐浩修的。還有〈寄柳幾何〉，詩曰：

<sup>13</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韓客巾衍集序〉，頁200-202；又見《韓客巾衍集》前。

<sup>14</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韓客巾衍集序〉，頁187。

<sup>15</sup> 李調元：《童山詩集》，《函海》本，卷一九〈幾何主人歌〉，頁一上至一下。

<sup>16</sup> 同上注，卷一九〈漫言〉，頁一下。

秋從昨夜來，舉頭見飛雁。如何春水波，人去長不見。去年籬下菊，今復掇其英。如何白衣人，不復門前迎。思君令人老，思君令人瘦。人老尚可支，人瘦不可救。故鄉在西蜀，時於夢中望。及夢翻在東，常若來君旁。風搖梧桐影，雨動芭蕉葉。謂是君忽來，不見君步履。只此白硯紙，曾為君所遺。還以書贈君，寄我長相思。<sup>17</sup>

這是他們分別之後，李調元懷念柳琴所寫的詩歌，情真意切，令人感佩。在柳琴的侄子柳得恭的《並世集》中，亦收錄幾首李調元懷念柳琴的詩歌。詩曰：「甕中柏酒壓槽濃，有客來從箕子封。才喜相逢恨相別，鴨頭春浪幾千里。」「天寒風勁撲窗紗，佳客論心細煮茶。日暮歸懷留不得，惟將明月托天涯。」「筆談字字沁人心，鴨綠江無此意深。別後故人如見憶，雁書應有自雞林。」「三韓雖異國，四海本同家。相遇非雍齒，知音是伯牙。來時齋有韻，去想筆生花。秋水人猶溯，何堪萬里涯」。<sup>18</sup> 這些都是李調元談及與柳琴相逢、相交、相知、相念的事情。<sup>19</sup> 從這幾首詩中可以想見他們之間的真情厚意。

柳琴要為徐浩修求詩，原來是：「副使來啟云：僕官雖清華，志在林泉。去京百里之地，有白鶴嶺，頗有丘壑之勝。新建一亭，名曰見一亭，取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也。乞題詩攜歸，以侈園林之觀。」<sup>20</sup> 李調元贈以《看雲樓集》，並題詩二首以贈，詩曰：

激流勇退古難尋，果見飄然返故林。自古詩人無假語，如今若個是真心。世傳永叔歸田錄，客奪昌黎諛墓金。聞道羊腸無限險，見幾誰是早投簪。

得歸三徑就荒蕪，點檢松杉十倍羸。尚有頭巾堪漉酒，絕無手簡問催租。鹿迷雪嶼逢樵叟，魚擲煙波訪釣徒。莫學放翁太顛劇，家家團扇畫成圖。<sup>21</sup>

徐浩修是朝鮮後期的重要官員，後來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八十壽辰萬壽節時，再度來北京，又寫下了《入燕記》，得以留存。乾隆四十一年這次則未見有類似的資料留存於世。乾隆五十五年，李調元早已罷官遠戍，所以再也見不到他了。

<sup>17</sup> 同上注，卷一九〈寄柳幾何〉，頁六下至七上。

<sup>18</sup> 柳得恭：《並世集》，卷一〈李調元：幾何柳公來訪〉，收入《燕行錄全集》第60冊，頁82；同卷〈李調元：幾何再訪〉，頁82；同卷〈李調元：懷幾何子〉，頁83。

<sup>19</sup> 這幾首詩並未收入李調元《童山詩集》中。從所收錄的李調元詩看，柳得恭所錄的詩與《童山詩集》中的詩，意思相近，都反映出他們關係之親密。

<sup>20</sup> 李調元：《童山詩集》，卷一九〈寄題徐副使浩修見一亭二首並序〉，頁六上至六下。

<sup>21</sup> 同上注。

《韓客巾衍集》現存不少鈔本，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就收有多種。筆者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亦讀過兩種鈔本。全書四卷，前有李調元與潘庭筠之序，還有兩人的評論。李調元的評論是藍色字跡，潘庭筠的評論則是紅色字跡。署名為「洌上柳琴彈素抄」。因為清朝學者李調元、潘庭筠之評點及序言，四人詩名於是聞於北京，又傳回朝鮮，四人詩名遂在朝鮮廣為流傳。此書長期以鈔本傳世，朝鮮最早的刊本刊於1916至1917年間，後來多次重刊，並更名為《箋注四家詩》，<sup>22</sup>乃是一部中朝詩人交往的見證之作。也正因為有了這部詩集的傳入，從此開啟了朝鮮詩人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與清朝學人李調元、潘庭筠等人的交往，在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成就了一樁佳話。此詩集的西傳得到良好的反響，因此激起了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的西來，從而為他們了解清朝，提倡北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 李德懋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韓客巾衍集》第一卷乃是李德懋的《青莊館集》，開篇介紹作者道：「字懋官，號炯庵，漢城府人。貫全羅道完山府。辛酉〔1741〕生，年三十六。著有《青莊館集》。」可見，當年李德懋三十六歲，是四位詩人中年紀最大的。此書收錄李德懋詩九十餘首，李調元跋尾曰：「《青莊館集》，造句堅老，立格渾成，隨意排鋪而無俗豔，在四家中尚推老手。」潘庭筠評曰：「炯庵錘字煉意，力掃凡溪，別開異境，晚宋、晚明之間，應踞一席。又如火齋木難，觸目都是奇寶，非尋常近玩之比。」<sup>23</sup>評價非常高。

柳琴回國，李德懋看到兩位的評語，非常高興。當即提筆給他們寫信，在給李調元的信中稱：

<sup>22</sup> 參見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457；金柄珉：〈《韓客巾衍集》與清代文人李調元、潘庭筠的文學批評〉，頁67-72；徐東日：《李德懋文學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3年），頁204。金柄珉、徐東日在其論著中皆認為此書在清朝詩壇影響很大，而且認為有過刊本，但是讀完其文，並未說明何時由何人刊行，而現今也無法找到清朝刊本。此書柳琴拿回朝鮮後，在清朝詩壇大概只有李調元、潘庭筠等友人了解，後來亦未見清人有過刊行，因而不能過份誇大此書在清代詩壇的影響。此書對於朝鮮的影響當然是非常之大的，而此後此詩集中的四位詩人在朝鮮也就聲名大噪，以「四家詩」而出名了。

<sup>23</sup> 《韓客巾衍集》，卷一。對於李調元與潘庭筠的評點，徐東日《李德懋文學研究》一書有詳細的研究，此書的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點（頁204-12），專門討論了李調元、潘庭筠對李德懋詩歌的品評，指出李調元評點李德懋的詩歌有28條，潘庭筠評點李德懋詩歌有19條，二人合計有47條。

彈素之歸，自詫遇天下名士，仍出《巾衍集》，使不佞輩讀之，果然朱墨煌煌，大加嘉獎。序文評語，爾雅鄭重，真海內之奇緣，而終古之勝事也。顧此下土小生，何以得此于大君子，相顧錯愕，如出天外，心不自定。……不佞樗櫟賤品，瓦礫下才，只是秉性迂直，愛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飲江、河、漢、洛之水，足不蹈吳、蜀、齊、魯之地，枯死海邦，有誰知之！……今既為先生及潘秋厓先生所知，畢生之恨，庶可少展。<sup>24</sup>

可見，能夠得到李調元、潘庭筠的獎賞，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信函中表達著一種知遇之恩，而且透露出他渴望前往北京。當時，李調元不僅給《韓客巾衍集》寫序、評點，而且託柳琴帶給他《粵東皇華集》，並將自己的小照相贈，又親筆書寫「蟬橋堂」贈送給李德懋。李調元還贈送一包落花生給李德懋，李德懋記其原委道：

綿竹李雨村（調元）謂柳彈素（琴）曰：「此菓南方廣東、四川皆有之，係草本，四月開花，花謝落于沙池之上，因成菓，與本身不相連屬，即於沙土中取出，明年下種，又成根苗，花落地上，結實如前。北方地冷不產。蓋以子為種，宿根不復生。」彈素曰：「吾友李懋官多識草木，欲使見之。」雨村曰：「一包帶回東土，以試懋官。」<sup>25</sup>

李調元自己亦有〈落花生歌〉詩，詩曰：

我聞黃梅四祖偈，無人下種華無生。獨此花生即為種，花落結實如坻京。其生滋蔓若藤菜，細葉牽露朝含英。金絲飛墮輕無語，沙中甲拆春雷鳴。以花為媒非為母，媒即其母實其嬰。此種粵蜀賤非貴，北人包裹遺公卿。今春柳子來過訪，屠蘇正熟相歡迎。坐間花菓細辨證，一一多識吾所兄。就中獨此詫未睹，特與翻縷詮物情。懷歸戲載果下馬，要試友輩猜相瞠。昨者長鬚投翠織，開緘騷句兼屈平。本草圖經補未備，異邦小阮重留名。目中有菓人何在，相思但願身翻輕。可憐困鈍真老矣，何時再與鷗相盟。<sup>26</sup>

可見，儘管是初次相交，竟然如同相知甚久的老友，贈送各種禮物，甚至於稀奇的果物。落花生當時在朝鮮半島還沒有種植，柳琴覺得新鮮，李調元也就贈送一包，轉寄給李德懋。李德懋收到這些禮物和《韓客巾衍集》的序文、評點，在給李調元的信中，表達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且進獻七絕四篇，並向他請教一些書籍與版本上的問題，從此就開始了與李調元的書函往來。

<sup>24</sup>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李雨邨調元〉，頁266。

<sup>25</sup> 同上注，卷五八〈落花生〉，頁27。

<sup>26</sup> 李調元：《童山詩集》，卷一九〈落花生歌〉，頁四下至五上。

接到李德懋的信函，李調元當即回覆。可見，李德懋與李調元、潘庭筠的交往，正是因為《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從此就相交而相知，在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來北京見面之前，他們已經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信了。正如李德懋自言：「以文而不以幣，以心而不以面，尺書去來，片言相契，披丹見素，萬里匪遙，此係不佞至誠之攸感，亦見先生真心之相向。」李德懋更直言：「從今以往，奉為知己，惟我先生，慎勿辭避。……贈之以石，喻以石交。」<sup>27</sup> 後來李德懋與朴齊家同赴北京，無奈李調元已遠赴廣東，從而失去了與他們見面的機會，此後彼此就以書函往來，成為未曾見過面的知己，可以說是真正的知交。儘管沒有見過李調元，但見到了李調元的堂弟李鼎元與李驥元，並託李鼎元轉寄一封書信，還有他的《清脾錄》，希圖李調元評點並作序，他們之間真正是詩文相交、心心相印，也可以說正是《韓客巾衍集》成就了他們交往的佳話。

在看到柳琴拿回來的《韓客巾衍集》時，李德懋也給潘庭筠寫了信，說道：

不佞左海鯁生，孤僻寡和，開口相笑者，只五六輩，閉門潛居，落落悠悠，所大願乃學古人慕中國而已。湛軒洪先生，奇士也。游燕而歸，每說篠飲〔陸飛〕、鐵橋〔嚴誠〕、秋庠〔潘庭筠〕三先生風流文物，照耀江左。仍示其談錄及詩文墨蹟，不佞欣然欲起舞，悽然又泣下。以其朋友之感，藹然觸發，自不覺其如此也。昔者，舌官李白石持獻不佞雜纂一篇于先生，先生大加獎誦，稱為高士。人非石腸，安得不感！信息茫茫，於今十載。茲因友生柳彈素接見雨邨先生評序《巾衍集》，忽又見先生手筆評序，茫然失魄，如從天降。無中生有，絕處逢生，鋪張震耀，令人顛倒，此振古之奇事，天下之壯觀。矧又評品精確，眼光如月。四人合席，感淚橫集。

前日，湛老因三河縣孫蓉洲致書先生，非至一再，終不傳致，頗自失望。不意于今得讀先生〈巾衍評序〉，喜故人之不忘，恨歸使之無音，此豈先生邁邁而然也？亦是公事忽忽之故也？不知先生以為如何？鐵橋先生遺書幾部？而開雕行世否？其尊兄九峰先生亦云無恙耶？湛老每思鐵橋，惻然傷懷，欲知其忌日，願先生示之也。起潛先生嶽崎歷落，近作何狀？見在何處耶？吳西林先生尚令〔今〕康健否？亦示其名字，可也。

不佞今者致書先生，或似唐突，而論其交則十年；語其契則知音，故忘其僭妄，輸瀉心曲，感以四首七絕，獻以為贄，願先生庶不鄙夷，賜和可也。<sup>28</sup>

<sup>27</sup>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一九〈李雨邨調元〉，頁266。

<sup>28</sup> 同上注，卷一九〈潘秋庠庭筠〉，頁262-63。

對於潘庭筠，李德懋自言「交則十年」，乃是從洪大容之燕記中，早已熟知其人品學識，仰慕不已。所以在給潘庭筠的信函中，特別提及洪大容的事情。他們將《韓客巾衍集》帶往北京，尋求清人之評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到洪大容與清人交往事情的鼓勵，而李德懋原本並不認識洪大容，正因為洪大容有與清人交往的先例，他主動前往結識洪大容，並且將相關的材料一一拜讀，所以潘庭筠的名字早已嵌入其腦海裏。在給潘庭筠的信中，洪大容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一則給潘庭筠傳達故人的消息，給他們溝通資訊；二則，也表明他對於潘庭筠早已瞭若指掌，仰慕甚久。對於潘庭筠的評價，李德懋賦詩一首：「專門漢魏損真心，我是今人亦嗜今。晚宋晚明開別徑，蘭公一語托知音。」<sup>29</sup>認為潘庭筠的評價乃是「知音」之談。

在表達仰慕感激之餘，亦多發問請教。隨後又多有往復，李德懋第二次致書言：「惟我二人，一生於三吳佳麗之地，一生於三韓僻陋之鄉，山阻海隔，不啻天壤。只是天付摯情，鬼勸異事，元無半面之雅，仍成同心之友。」<sup>30</sup>表達了「知音」之義。在李德懋的《青莊館全書》中，收錄了給李調元和潘庭筠的書函各三通，皆是李德懋未見到他們之前所寫的。可見，因為有了《韓客巾衍集》的相知，李德懋時時惦記著那份「知遇」之恩，向他們表白感激之情。

在與李調元、潘庭筠書函往來兩年以後，李德懋終於有機會前往北京了。<sup>31</sup>柳琴入京之第三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正祖二年，1778）三月，李德懋與朴齊家同赴北京，李德懋自言：「余與朴在先齊家願欲一見中原，齋志未果，至是，沈蕉齋念祖克謝恩陳奏使書狀官，與余有雅，要余偕行，在先亦隨上使蔡公濟恭而入焉。連袂並轡，萬里跋涉，足為友朋之韻事，亦不負男兒四方之志也。」<sup>32</sup>李德懋與朴齊家首次前往北京，離開漢城時，朴趾源、柳得恭等人前往送行。《韓客巾衍集》的先傳入北京，引起李調元、潘庭筠的關注與好評，更加激起了他們前往北京的興趣。

此次李德懋與朴齊家北京之行，只見到潘庭筠和李調元的堂弟李鼎元、李驥元，未見李調元。因為李調元在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就授職廣東學政，遠赴廣東了。<sup>33</sup>在北京期間，李德懋、朴齊家與李鼎元、潘庭筠相聚五、六次之多。儘管

<sup>29</sup> 同上注，卷一一〈題香祖評批詩卷〉，頁195。

<sup>30</sup> 同上注，卷一九〈李雨邨調元〉，頁267。

<sup>31</sup> 對於李德懋此次燕京之行，可參見王振忠：〈朝鮮燕行使所見十八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載 *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eoul: Ginying Monhuasha Press, 2004), pp. 135-72。

<sup>32</sup> 李德懋：〈入燕記〉上，收入《燕行錄全集》第57冊，頁190-91。

<sup>33</sup>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年），卷一〇三九，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頁920。

李德懋對於他們見面的筆談內容幾乎是一筆帶過，並不詳細，但是從見面的次數看，他們當時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從五月二十三日第一次見面，到六月十五日最後辭別，也只有二十餘日，他們有五、六次見面，而且幾乎每次見面之後，都有酒席宴會，往來可謂頻繁。

五月二十三日，李德懋與朴齊家首次前往潘庭筠住處拜訪，恰好李鼎元也在座。李德懋記其經過曰：「與在先訪李鼎元、潘庭筠于潘之寓舍。舍與吏部臨近，潘設盛饌待之。筆談如飛，可補晉人清談。」當年潘庭筠恰好中進士，為庶吉士，李德懋認為他是「翩翩名士也」；而認為李鼎元「人品坦白，無矜驕氣」。對於席間之物，李德懋特別記之，曰：「饌中鹽鴨蛋紫黑如玳瑁，葶薺如栗，請齋獻使臣。香祖為沾兩種以贈之，使馬頭鄭觀送於館。葶薺，水中之草，無花。鴨蛋鹽淹者，皆南物也。亦有青螺羹、坐魚臠、水母、鯊魚翅之屬，皆異品也。」<sup>34</sup>這是李德懋與朴齊家第一次拜見潘庭筠，他們對於潘庭筠早已從洪大容的《燕行記》中獲知甚詳，又通信數次，彼此都相當熟悉，對潘庭筠十分敬仰；而潘庭筠也從《巾衍集》中，先得讀他們的詩歌，甚為賞識，書函往來之中，早已訂交。故而，第一次相聚，潘庭筠就設酒宴款待。雖為初次見面，實際上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後來又有過幾次面談，在李德懋、朴齊家臨別前，潘庭筠特別在家設宴為他們二人餞行，李德懋稱潘庭筠「與東方人相交，情甚敦摯，有戀戀不能相捨之意」。<sup>35</sup>李德懋將其所編的《清脾錄》交給潘庭筠，讓他評點並寫序，續寫《韓客巾衍集》評點的友誼。

可見李德懋與李調元、潘庭筠由《韓客巾衍集》而開啟他們的詩文之交，而後彼此通信數年，並時有詩文唱和之舉。後來李德懋終於有機會前往北京，與李調元則失之交臂，但與潘庭筠有過數次之會，彼此談詩論文，切磋學術，相談甚歡。隨後，李德懋又將自己的詩話新作《清脾錄》交給潘庭筠，讓他加以評點並作序，也讓李鼎元將此書轉呈遠在廣東的李調元，同樣請他評點並作序。自始至終，他們都是詩文相交，以文會友，成就了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一樁佳話。

### 朴齊家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韓客巾衍集》的西傳開啟了朴齊家與清人交往的先聲，後來朴齊家三次來到北京，與清朝學人過從甚密。回國後，他一反原來「尊周派」拒斥清朝的態度，寫了〈尊周論〉，對尊周派大加撻伐，同時給朝鮮國王上《北學議》，積極提倡向清朝學習，提

<sup>34</sup> 李德懋：〈入燕記〉下，頁291-92。

<sup>35</sup> 同上注，頁306。

倡北學。朴齊家遂成為北學派的主要代表，對朝鮮後期的思想界產生重要影響。正是《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奠定了他與清人交往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韓客巾衍集》的西傳也可以說催生了朝鮮北學派的形成。

《韓客巾衍集》卷三為朴齊家詩《明農初稿》。集中對朴齊家介紹道：「字在先，號楚亭。漢城府人，貫慶尚道密陽府，庚午〔1750〕生，年今二十七，著有《明農初稿》。」<sup>36</sup>當年朴齊家二十七歲，此書共收錄朴齊家詩歌近百首。李調元跋尾道：「《明農初稿》，工於七律，夢得、香山，其鼻祖也。而嶽崎歷落之氣，則似過之無不及焉。」潘庭筠評之曰：「楚亭詩脫手如彈丸，不為僻澀之音，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耳，襟期磊落，如見其人，頡頑四家未易定，王盧前後也。」<sup>37</sup>而且對於集中所選的大部份詩歌，每首皆加以評點，大加獎賞。

朴齊家與李德懋一樣，看到李調元與潘庭筠的序文與評點，內心之狂喜溢於言表。在給李調元的信中，這種心情表露無遺：

齊家，海外之鯁生也，年今二十有八歲。家人罕覩其面，鄰里不聞其名，不意今者因敵友柳君彈素所抄《巾衍集》，見賞於中朝之大人，傾倒淋漓，不啻若合席談，而傾蓋遇也。此固畢生之大幸，不世之奇緣也。始而聽之，驚疑失當，以為此特大君子包容之盛心耳。及觀其評點之語，深入腠理，歷歷有當于心，決非尋常過去之比。然後直欲僂僂，輕舉飛落燕邸，望顏燒香，頂禮而返！嗟乎，士為知己者死，豈其好譽惡短而然哉！亦必有舉國非之而不懼，一人是之而過望者矣。何則？寸心之自知，不可以苟欺也。<sup>38</sup>

這是一種大旱逢甘霖的感覺。朝鮮是個極其嚴格的等級社會，朴齊家儘管也是出身兩班家族，但是並非嫡系子孫，而是庶子，這樣註定他無法出頭。按照朝鮮的規定，他只能任一般的中下層官吏。儘管他滿腹經綸，但是懷才不遇，無法得到施展的機會。他所謂「家人罕覩其面，鄰里不聞其名」，應是一種真實的寫照，而非謙遜之辭。他的詩歌傳入清朝，卻得到了這麼高的評價，怎能不讓他欣喜若狂！其實，李德懋、柳得恭、李書九也幾乎是同樣的心境，這與他們在朝鮮得不到肯定有很大的關係。在得到清人讚賞之後，自然激發他前往北京的興趣，「雖然，齊家庶幾天察其衷，得隨歲貢備馬前一小卒，使得縱觀山川人物之壯、宮室車船之制，與夫耕農百工技藝之倫，所以願學而願見者，一一筆之於書面，質之于先生之前，然後雖歸死田間，不恨也」。<sup>39</sup>這封信表達了朴齊家對於李調元知遇之恩的

<sup>36</sup> 《韓客巾衍集》，卷三。

<sup>37</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巾衍集評〉，頁188，202-3。又見《韓客巾衍集》，卷三。

<sup>38</sup> 朴齊家：《貞菴閣文集》，卷四〈與李羹堂調元〉，載《楚亭全書》中冊，頁273-74。

<sup>39</sup> 同上注，頁274-75。

感激，從此開啟朴齊家與清人的交往。朴齊家一開始就將清朝學人視作朋友與知己，為他以後積極前往清朝，也積極了解和學習清朝提供了基礎。

李調元收到朴齊家的信，當即給他回覆。李調元在信中首先稱「僕於君，非有握手之緣，而以情相得如此，此亦有緣焉」，接著進一步肯定他詩歌的成就，推許為「置架曹、劉，近亦在盛唐以上，洵人群之鶴而藝圃之鳳也」，並期待能有「共酒食之會、文字之歡，其與上下議論，參酌乎金石鼎彝之間」，並贈送自己的著作〈金石闕文考〉給他。對於朴齊家之熱情，李調元給予了積極的回報。稱頌其文「有生氣勃勃貫乎其中者，其文必與天地同壽」。<sup>40</sup> 這樣，他們的友誼繼續得以發展，朴齊家在朝鮮本國得不到肯定，但受到異國士人推許，使他更加嚮往清朝。

朴齊家給李調元寫信的同時，也附上一首詩，詩中有言：「前日遇吾友，片言輸真意。中外即一家，群議不足道。雞林一卷詩，木瓜瓊瑤報。詩中有知己，珍重一言付。小照來颯爽，迢迢鴨水渡。萬里懸弧日，人間臘月五。生死結寸心，酒一香一炷。未登清必閣，欲繡宛陵句。拜像如拜佛，閩集堪千古。」李調元和詩曰：「從來名世輩，五百年一出。豈意海之東，群賢聚一室。江河萬古流，何異唐四傑。觀其金石聲，殆是錚錚鐵。造化至至公，人材不擇地。我看朴夫子，尤為脫俗累。寄我述懷詩，簡澹多古意。風雅久淪夷，陶謝誰為道。經田百不耕，往往鹵莽報。君以經為詩，良由得深造。尋思未得故，意者天所付。……天涯有知心，因風吹好句。鳳來為儀韶，鰲知應鳴鼓。願從漢魏還，勸哉倍稽古。」<sup>41</sup> 首次書信往來，詩文唱和，彼此惺惺相惜，如同相交甚久的知己。

正如前所提及，乾隆四十三年，朴齊家與李德懋一同前往北京，因為李調元時遠調廣東，未能見面，但是他們的交誼並未因此而結束，以後朴齊家又於乾隆五十五年（1801）和嘉慶六年（1801）兩次前往北京，但好像始終未能與李調元見面。因為李調元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因事被革職。事因乃是李調元為通永道員時，去盧龍縣為朝中修《四庫全書》押運書籍，但有人告他「並不親身照料，玩誤差務」，而且「李調元過境，必須大郭棟泰戲小班伺候。宴飲住宿，並未隨書前進。家人需索門包，胥役各有使費各情節」。乾隆帝覽奏，十分惱火，下旨曰：

李調元，竟出朕意料之外。此等擾累屬員，濫索供應，在督撫如此，尚必嚴加懲治，何況道員！前在吏部員外任內，於議駁典史劉培章一案，意欲兩議，擅自銷押。經吏部堂官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於京察填入浮躁。朕以該員年力富強，敢與堂官執持，似有骨氣。且詢之程景伊，稱其平日辦事

<sup>40</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李調元〈朴楚亭先生啟〉，頁179。

<sup>41</sup> 同上注，卷一〈先公原韻〉，頁176-77；同卷李調元〈楚亭先生〉，頁175-76。

尚屬勇往，是以格外加恩，仍以吏部員外用，並簡放學政。任滿來京，即擢用直隸道員。上年曾將該員居官如何之處，面詢袁守侗，該督亦意存不滿。朕以該員係邊省人，不善迎合上司，容或有之。孰意該道不知感激奮勉，恪盡職守，竟敢恣意妄行，騷擾所屬州縣，並縱容家人胥役，需索門包使費，種種劣員。且李調元係棄瑕錄用之人，乃竟辜負朕恩，肆意妄行若此。李調元著革職拏問。<sup>42</sup>

乾隆皇帝新帳、老帳一起算，李調元被罷職，而且不久被遠戍邊疆，從此遠離官場，後來得大臣擔保，赦免回家。李調元仕途不得意，只得寄情山水，沉溺於詩酒之間。朴齊家的兒子朴長蘄編輯《縞紵集》時所作的凡例中稱：「李雨邨、潘秋厓、鐵冶亭三人者，則先以詩文書笥相通，而後竟面接。」<sup>43</sup>與潘庭筠、鐵冶亭見面是實，不過，這裏說朴齊家與李調元見面，則應該有誤，因為朴齊家後兩次來京，李調元早已離開北京，隱居故里了，不過長期保持通信聯繫，則應該不錯。因為有《韓客巾衍集》的序文、評點之誼，後來，朴齊家又請李調元為其文集《明農初稿》作序，其序文稱：

朴楚亭，東國之麗于文者也。其人短小勁稜，才情蓬勃。上探《騷》、《選》，旁采百家，故其為文詞，有如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焉；如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如熬燥之色焉；有如春陽、如華川者焉；逶迤迤迤，有如海運震怒動盪，怪異百出者焉。豈非天下之奇文哉！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萬里之外以求序于余，豈所謂獲助于古，不獲助于今乎？<sup>44</sup>

李調元對於朴齊家的詩文大加讚賞，如果說最初李調元評價《韓客巾衍集》，對於朴齊家還一無所知的話，那麼給其文集寫序時，他們已經是相交甚久的老友了。收到李調元的序文，朴齊家馬上給李調元寫了一感謝信，信中稱：

嗟乎，不佞誠何人哉！鰲處龜居二十七年，一朝被大君子吹噓剪拂，無所不至。寒谷迴春，枯木生華，雖有鐵腸，寧無感泣！不佞迂士也。與時無當，性又多悲，每於秋冬之際，百端交集，雖家人朋友，莫能相解。幼時號曰楚亭。楚亭云者，讀楚人之騷者也。至於文章，尤無深造。固不敢與藝苑諸公

<sup>42</sup> 《清高宗實錄》，卷一一七一，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下，頁699-700。

<sup>43</sup> 朴齊家：《縞紵集》，〈凡例〉，頁5。

<sup>44</sup> 朴齊家：《楚亭全書》上冊之李調元序，頁11-12。李調元《童山文集》（嘉慶十四年重刊本）卷五頁一三上至一三下收錄〈明農初稿序〉，與此文字詞上稍有不同。

爭長較短，亦未嘗以傳與未傳，置諸胸中，時時命筆，略見其志。自以為詩不強作，文附經濟，慨然慕鄭漁仲、顧寧人之為學，哀民生之日乏，憫同志之多窘。欲學中國之制，築土室，造水車，省費而厚斂，移風俗於一鄉，庶朋友之無違，此夙夕之苦心也。雖然以眇然之身，而有大庇之志；無終夕之憂，而望百年之惠；難矣哉。所以為此言者，欲使天涯知己，想其人而恕其妄耳。

來序有云：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悲哉言乎！抑何以遙度也！萬里神交，不自覺其熱淚之無從也。序文茫洋曲麗，以莊騷之才，行三禮之學，發以奇氣，斂以真心，文至於此，能事畢矣。自顧無狀，何以得此。竊自幸夫福力之甚厚也，書中有忠臣孝子，以氣為文之語，尤為感激，因其言而求其至，則先生之所賜多矣。嗚呼，人孰無交如今日之於先生者，蓋幾希矣。惠風前日有詩云：「同里十年多未識，手中川蜀故人書。」豫為不佞今日而發也。《詩》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又：「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不佞今特書此以奉。<sup>45</sup>

信函中知遇、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在朴齊家的《楚亭全書》中收錄多首懷念李調元的詩歌，其中有言：「書來忽地墜虛空，說未傳時意已通。西笑無端懷舊雨，東臨何處慕長風。天涯友道悲籠鳥，海外詩名付靈鴻。弗恨龍門生未遇，襟期省識畫圖中。」「生來不見看雲樓，萬里人歸磊落州。蜀道青天嗟遠別，秦風白露又深秋。纔聞宦跡追貽上，還把文章配用修。留得十年香一瓣，樂浪西畔夢悠悠」。<sup>46</sup> 朴齊家給李調元寫過好幾首詩，但是在其文集中，這些詩歌並沒有完全收錄，反而是在朴長醜編輯的《縞紵集》中，收錄了其他未曾收錄的詩歌。從這些詩歌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們交往的經過，也能考察他們之間的感情，是研究他們關係的重要史料。

看到潘庭筠給《韓客巾衍集》的評點及序文以後，朴齊家也當即給潘庭筠寫了一封信，信中有言：

足下之知吾，自《巾衍集》始，而僕之交於足下者，蓋已十年矣。僕與洪湛軒初不相識，聞與足下及鐵橋嚴公、篠飲陸公結天涯知己而歸，遂先往納交，盡得其筆談唱酬詩文讀之，摩挲不去、寢息其下者累日。嗟乎，僕，情人也。闔眼則見足下之眉宇，夢寐則遊足下之里閭，至作擬書欲自達而止，可覽而知也。何幸天緣湊合，敝友彈素柳公得交於李雨邨先生，因而又與足下

<sup>45</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李調元〉，頁34-36。

<sup>46</sup> 同上注，卷一〈寄雨邨詩〉、〈又寄雨邨詩〉，頁38-39。

通，其殷勤至出敝集而批評之，自此以往，僕之心固已得接於吾秋庠之前矣。意者，精誠所到，鬼神通之而然耶？其跋語之翩翩，序文之丁寧，各能隨事而盡意。其與雨邨先生時有不同處，亦足知其指意之所在。可知中朝君子慧眼如月，無所容其毫髮之欺蔽也。僕素不喜為詩，且其才品最下，於集中之諸君子而若其慕中國之苦心，則諸君子亦各自以為不及也。非詩之足稱，庶幾因此而附尾而得不朽於千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篠飲之進士，見作何官？何時在京？從今以後惟願一見秋庠之顏範，傾困倒稟，當勝讀十年書也。未知竟成此志否也？篠飲先生處亦有信息，幸為致意。山川間之後會無期，臨楮惆悵，魂銷目斷，奈何奈何！忙甚，未及盡意，統希雅照。<sup>47</sup>

這是朴齊家給潘庭筠的第一封信，如同李德懋一樣，朴齊家對於潘庭筠已是相交甚久了。他原本並不認識洪大容，只因有感於洪大容在北京與三士相交的故事，遂前往拜訪，並將相關的唱和詩文及筆談記錄一一讀之，故而自言「僕之交於足下者，蓋已十年」，以至「闔眼則見足下之眉宇，夢寐則遊足下之里閭」，對於潘庭筠仰慕甚久。而對於他的評點「跋語之翩翩，序文之丁寧，各能隨事而盡意」，認為「中朝君子慧眼如月，無所容其毫髮之欺蔽」，並問及洪大容的原先舊友。如同李德懋一樣，他對於潘庭筠也自認為是故友。

半年後，潘庭筠收到朴齊家的信，甚為驚訝，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四日覆信：

春間讀《巾衍集》，始知先生名，欽服妙詠。及三君子之作，歎為目中所罕見，深以未得相與題襟為憾。懸擬先生品望，必嶽崎磊落，迴異恒流。讀詩可以知人，又見詩注中猥及賤名，感先生之知筠，而愧筠之不能知先生也。詩卷迫於朝夕持去，匆匆一讀，又未獲盡窺藩籬，鈔掇僅二三十首，益滋愧矣。

頃接手書，雅意懃拳，獎許逾分。又讀八年前擬寄筠書稿及筆談跋語，感且欲泣。先生之知筠久且深如此，而筠懵然未知。一朝知之，即千里命駕，終身追隨，猶恨其晚，況都不可得。雖木石鹿豕亦難為懷，不特令人感交道之重也。

先生初未識洪君湛軒，聞其入都訂天涯舊雨，而即往友其人。又因洪君而愛及屋烏，並欲以其友為友，雖古人之重交道，亦未有若此者。即使旁觀之輩，亦必增其意氣，況筠之獲知既深且久乎？至於文章之妙，波瀾老成，又如春雲出峽，態度藹然。雜誦數四，沁入肝脾。即此詩文之間，尚愧知先

<sup>47</sup> 朴齊家：《貞菴閣文集》，卷四〈與潘秋庠庭筠〉，頁277-79。

生未盡，何況知交之感鬱勃於中，而不能自己耶？人生終身晤對，往往不足言交。而關河間阻，未謀一面，聞聲相思，神交彌摯，古人亦或有之，然求如先生之於筠，未之前聞矣。萬里而外，千載而下，亦復有知筠兩人之交若此也耶！使去期促，倥偬奉簡，命作集序及堂額，容續寄上，臨池依溯，馳念不盡。<sup>48</sup>

在此信函中，潘庭筠對於朴齊家如此了解他，尤其是知道朴齊家為了弄清楚洪大容與他們交往的故事，特地前往拜訪，閱讀他們交往的筆談記錄以及唱和之詩文，甚為感動。

乾隆四十三年，朴齊家在北京與李德懋一同拜訪潘庭筠，彼此終於見面了。在北京期間，他們見面五、六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朴齊家又去北京兩次，每次都與潘庭筠面談。在朴齊家兒子編的《縞紵集》中，還收錄了一段他們的筆談記錄，當是乾隆五十五年朴齊家前往北京時與潘庭筠的面談記錄。其中潘庭筠有言「十年前，已讀大集」，即是指《韓客巾衍集》中的《明農初稿》。潘庭筠問及李書九、洪大容後人的近況。又問及朝鮮之禪學是否興盛。朴齊家說：「都是無室無家人遯跡，無士大夫削髮者。所謂士大夫，亦頭出頭沒于宋儒小注中，我到此方能一出口氣。江南王學浩椒畦相熟否？他畫山水寄吾，我今倦遊，不得作天涯想。但王事來逼，必當復來。我今日又作一緣矣。尚憶潘郎少年時事吾亦髮種種，當買一空帖，請公作詩跋及小畫歸，作案上思。想此事如來，當首肯？」<sup>49</sup>想請潘庭筠作詩跋及畫。潘庭筠答應了他的要求，後來果真贈畫給朴齊家。

隨後，朴齊家又請潘庭筠給其《貞蕙閣詩集》寫序，潘庭筠也不推辭，寫道：

朴子楚亭，生於海東，讀書自《洪範》以下，凡國人之撰著，固所素習，而中朝四部之書為其國所易購者，尤篤好而深思焉，可謂能力學者矣。吟詠之富，斐然成卷，亦宜也。然竊疑其登覽所及，惟在八道二十一都之中，未馳城外之觀。其詩雖瑰麗可喜，或者止於此。于今乃隨使臣渡鴨綠江，過鳳凰城，策馬於崆峒戴斗之郊，瞻皇都之壯麗，覽帝京之景物，洋洋乎極天下之巨觀。拓心胸而增〔增〕學識，吾知其詩格之益進也。客曰：朴子年甚壯，志甚遠，使其蹤也。復登海舶，南至於吾妻之島，西至於歐羅巴之洲，汪洋恣肆，縱其所如，然後搖筆放謔，抒寫奇氣，其詩不更工乎？余則以為不然。詩之學自三唐兩宋，上窺漢魏源流，溯源至《三百篇》而止。若欲雅於《頌》之外，別求所謂皇娥白帝之謔，心摩而手追之，可以謂之工乎？邦畿千里，惟

<sup>48</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朴楚亭先生書〉，頁192-94。

<sup>49</sup> 同上注，卷一〈潘庭筠〉，頁45。

民所止，今朴子知所止矣。裨益者，大非特工於詩而已，又奚取乎遠驚哉？如客之說，轉慮其窮大而失居也。朴子之集成，即以余言為緣起可耳。<sup>50</sup>

對於朴齊家的學識與詩風皆加以很高的評價。對其詩中所涉獵的範圍，從朝鮮八道二十一都，到清朝「帝都之壯麗」、「帝京之景物」皆有吟詠，「洋洋乎極天下之巨觀」，深表稱頌。但是詩之源頭乃是《詩經》，捨此不得他求。事實上，這是《韓客巾衍集》作序評點的繼續，他們的交往也可以說是《韓客巾衍集》的延續。

朴齊家對於潘庭筠甚為敬仰，他稱頌潘庭筠：「學問淵邃，性好佛。……縱使生於中國，得與斯人同里同閭，促膝攜手。」有多篇寄懷詩歌，有詩曰：「那知妄想本來空，齋志天涯竟得通。萬里杯尊迎素月，一封書笥向西風。瀟波不辨吳門馬，雲樹相思北地鴻。慙為多情人易老，潘郎消息十年中。」又有〈懷香祖詩〉曰：「蘭公夙緣重，萬里三相見。漸看禪理精，偏憐宦遊倦。拈花送遠客，經聲度深院。」〈續懷詩〉：「千花成塢禮瞿曇，憶共觀音寺裏譚。聞說長齋潘御史，乞攜野笠過江南。」<sup>51</sup> 深深地表達一種感激之恩。

其實，在三次前往北京期間，朴齊家拜見過的清朝學人有五十餘人之多。在朴齊家的《貞蕙詩集》中，收錄了他懷念清人的詩歌。他在〈懷人詩仿蔣心餘〉詩序曰：「余以不才，三入燕京，中朝人士，不鄙而與之傾倒焉。倦遊既罷，悵觸於中，追述舊事，得知名五十人。」<sup>52</sup> 其中收錄致紀昀、德保、彭元瑞、翁方綱、吳省欽、李調元、李鼎元、羅聘、洪亮吉、孫星衍、吳廷燮、潘庭筠、錢東壁等人的詩。在這些懷念故人的詩歌中，對於李調元與潘庭筠，朴齊家有更多的情感。因為正是《韓客巾衍集》開啟了他們的交往，而後總是有深深的感激與知遇之恩，所以在請求清人作詩序與文集序時，李調元與潘庭筠總是他的首選之人。他們就在這種詩文唱和與筆談中繼續發展友誼，而正是在這種交往中，朴齊家一點點地了解清朝的學術文化與政治經濟，加深對於清朝的全面了解，為他回國以後提倡北學積累基礎。

### 柳得恭、李書九與李調元、潘庭筠之交往

卷二乃是柳得恭詩，詩集一開始介紹柳得恭曰：「字惠風，號冷齋，漢城府人。貫黃海道文化縣。戊辰生，年今二十九，著有《歌商樓集》。」<sup>53</sup> 當年柳得恭二十九歲，

<sup>50</sup> 朴齊家：《楚亭全書》上冊之潘庭筠序，頁7-9。

<sup>51</sup> 朴齊家：《縞紵集》，卷一〈潘庭筠〉，頁39-43；同卷〈寄秋帛詩〉，頁41。

<sup>52</sup> 朴齊家：〈懷人詩仿蔣心餘〉，載《貞蕙閣三集》，收入《楚亭全書》上冊，頁367。

<sup>53</sup> 《韓客巾衍集》，卷二。

收錄柳得恭詩近百首。李調元跋尾曰：「冷齋詩才氣縱橫，富於書卷，如入五都之中，珍奇海錯，無物不有。加以天資勝人，鍛煉成奇，故足令觀者眩目，此真東國之文鳳也。」<sup>54</sup>「冷齋諸體，莫不筆酣句健，輟櫟古今，味腴蹇芳，滌濯滓竅。……〈落花生歌長篇〉，敘次健而有體。此果本草無之，惟屈翁山《廣東新語》有其名，今得此歌，果名亦賴以傳矣。又曰《松京雜絕》，淒迷哀豔，千秋絕調，王漁洋〈秦淮雜詩〉不得擅美於前。」<sup>55</sup>潘庭筠跋尾曰：「冷齋才情富有，格律獨高。時露鯨魚碧海之觀。至於懷古登臨，尤多傑作。在《箕雅》中，定推大家。」<sup>56</sup>「〈圍爐〉一篇，似韓孟聯句，爭奇炫異，極意排募，才亦足以副之。……〈墨歌〉一章，山谷具茨之外，尤出一奇。〈落花生歌〉，可補稽〔嵇〕含《南方草木狀》。博雅之才，足以雄長一時。……〈二十一都懷古詩〉，兼竹枝、詠史、宮詞諸體之勝，兼廣異聞，必傳之作」。<sup>57</sup>朝鮮人非常看重他們的評論，在以後編輯柳得恭的《冷齋集》時，特地將李調元與潘庭筠的評論語放在卷首。

現在尚未發現柳得恭給李調元、潘庭筠的信，因而無法得知他是否像李德懋、朴齊家一樣，看到了《韓客巾衍集》中的序文與評點，當即給李調元、潘庭筠寫信。不過，乾隆五十五年，柳得恭與朴齊家同行，隨同進賀使徐浩修先往熱河，再往北京，即拜訪潘庭筠。柳得恭記其經過曰：「丁酉春，家叔父入燕時，序《巾衍集》。戊戌夏，懋官、次修入燕定交，又序《冽上周旋集》，遂致書于余。至是，次修先訪之，香祖方深居謝客，掛觀音像，朝夕頂禮，言及時事，果約彌深。八月十三日，太和殿宴禮，與之相逢，於午門前，引席並坐，談笑敘舊。」<sup>58</sup>他有詩曰：「人海人城擬一尋，傳聞御史禮觀音。端門執手猜相覘，誰識平生一片心。」<sup>59</sup>當時潘庭筠已經潛心佛法，儘管還是在朝中作官，但是已經不問時事了。事實上，潘庭筠也是官場不得意，乾隆五十年(1785)《四庫全書》成，參與編修的人員根據表現評等，潘庭筠曾參與編修，卻被評為第四等，其處置是「所有在館議敘升用之處，俱著註銷，仍各罰一年」。<sup>60</sup>不僅沒有得到獎賞，反而被懲處，所以潘庭筠心灰意冷，潛心佛法了。柳得恭在午門見到他，於是就敘起舊來。當時柳得恭與朴

<sup>54</sup> 同上注；又見柳得恭：《冷齋集》，《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本，卷前〈冷齋集評〉，頁3。

<sup>55</sup> 柳得恭：〈冷齋集評〉，頁3。

<sup>56</sup> 《韓客巾衍集》，卷二；又見柳得恭：〈冷齋集評〉，頁3。

<sup>57</sup> 柳得恭：〈冷齋集評〉，頁3。

<sup>58</sup> 柳得恭：《灤陽錄》，《遼海叢書》本（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卷二，頁694。

<sup>59</sup> 柳得恭：〈熱河紀行詩〉，收入《燕行錄全集》第60冊，頁28；又見《灤陽錄》，卷二，頁694。

<sup>60</sup>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上，頁415。

齊家同往北京，朴齊家因為以前拜訪過潘庭筠，所以此次進京以後，就獨自前往拜訪。李調元則早已被罷官，前往四川成都老家去了。

嘉慶六年柳得恭第二次前往北京，再次與朴齊家同行。他隨燕行使於四月初一日抵達北京，訪求《朱子集》善本，在北京呆了三十二日，於五月三日離開京師，起程回國。此次燕京之行，他拜訪紀曉嵐，「問李雨邨尚在成都落拓否？答徵歌選妓，玩水遊山，兼作詩話若干卷，甚得意也」。又拜訪李鼎元，問「雨邨先生平安，答尚平安」。<sup>61</sup> 這次不僅沒有遇見李調元，也沒有拜見潘庭筠，想必潘庭筠已經皈依佛法了。

柳得恭兩度前往北京，都未見到李調元，但是對於李調元還是心存知遇之恩。他載錄李調元之史料，曰：「丁酉春，家叔父游燕，與雨村訂交，屢造其室，以《巾衍集》示之，大加稱賞，許序刻之。寄其小像一本，為道生平年月日，請集中四人瀝酒建壽，其風致可想。……余在燕時，晤墨莊〔李鼎元〕、鳧塘〔李驥元〕二太史，聞雨村撰刻《函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種，頗及洌上唱和諸篇，尋以通水道罷官，日日聲伎自娛云。《函海》中一種也，李懋官《清脾錄》與余詩集多采入。」<sup>62</sup> 柳得恭與李調元並未見過面，但是彼此神交甚久，而這種神交，就是從《巾衍集》開始的。《函海》是李調元編刊的一部重要的叢書，全書一百五十種，分四十函。刻書始於乾隆四十三年春，迄於四十七年冬，耗時五年，但並未完成。實際上，因為此書未成之前，李調元在通水道犯事備罷官，並被充軍遠配，而雕版零落，後得友人陳琮相助，而李調元恰被保送回家，最終得以刻成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sup>63</sup> 此書可以分為幾個部份，第一，是西南之未見書為主體，大約佔一半的份量；第二，乃是楊升庵的著作，佔有六函的篇幅；第三，乃是李調元自己的著作。此叢書「皆《知不足齋》所未采者」，與當時的《漢魏叢書》、《知不足齋叢書》號稱三大叢書。不過，柳得恭所提的幾種朝鮮的書，並未收入其中，想必是所記有誤。

李調元對於柳得恭，從《韓客巾衍集》中獲知其詩其名以後，也是非常想結交的，其有言：「東國柳冷庵，詩人也。其叔彈素隨使臣來燕，得閱其《歌商樓集》。既批定之，因和其〈送叔詩〉遙寄，以當異地知己，何如？他日或來中土，當作竟夕談也。有客飛乘過海車，元談天外乍逢初。自言不學張津老，絳帕蒙頭讀道書。（公喜天文勾股之學，故也。）」<sup>64</sup> 柳琴乃是柳得恭之叔父，李調元獲讀其詩以後，當即給他寫了一首詩，遙寄「以為異地知己」，可見他們友誼之深。

<sup>61</sup> 柳得恭：《燕台錄》，收入《燕行錄全集》第60冊，頁193，198，202。

<sup>62</sup> 柳得恭：《並世集》，卷一〈李調元〉，頁81-82。

<sup>63</sup> 參見李調元：《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後序〉，頁四上至五上。

<sup>64</sup> 柳得恭：《並世集》，卷一〈李調元〉，頁83。

卷四為李書九詩，介紹李書九曰：「字洛瑞，號素玩亭。京畿永平縣人。貫全羅道完山府。甲戌生，年今二十三，著有《薑山集》。」收錄李書九詩近百首。李調元評之曰：「《薑山集》諸體皆工，而尤口口，原本陶、謝，而汜濫于儲、孟之間，詩品為最望矣。落日不逢人長歎，此品安得人常遇之。」<sup>65</sup>在四人當中，惟有李書九未曾來過北京，也未與李調元、潘庭筠見面，在李書九的文集《惕齋集》中，也沒有收錄與他們來往的信件。

李調元的《童山文集》中有一篇〈薑山集序〉，乃是給李書九著作所寫的序，但不見於李書九的《惕齋集》。序曰：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為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頗足為法，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為靡綺，而去古愈遠。唯晉之陶靖節和平淡遠，為千古學詩之宗，後之王、孟、韋、柳，各得其一體，而終失其自然之音。香山之擬、東坡之和，蓋又遠矣。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吾獨於薑山稿而竊歎靖節之去人未遠也。其為詩也可樂可觀，而無淫詞；可哀可歌，而無怨詞。鋪錦列繡，而不失於綺；長江大河，而不失於濫。灑灑乎一出於情之正焉。今試讀其句，如「攜筇出柴門，微雨過平陸。川塗暖新晴，墟里翳嘉木。家住碧溪頭，日夕溪風急。修林不逢人，水田鷺鷥立。豆人立沙岸，柳陰喚津船。數點洲邊火，遙知估客船。……」，如此例者，實得陶淵明自然之趣。余尤愛之，以其不事雕鏤而得乎清之正也。太羹不和，太音聲希，此之謂也。余不復窺其全豹，而所見已如此，所謂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者乎？後之讀《薑山集》者，即謂之讀陶集可也。<sup>66</sup>

由此可見，李調元對於李書九的詩推崇至於何種地步，以為只有他的詩得到陶淵明的真傳。李書九是朝鮮正祖時期的重臣，曾參與編修《尊周彙編》，也是朝鮮後期的重要詩人。

### 《韓客巾衍集》西傳清朝之影響與意義

《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帶來巨大的影響。首先，在朝鮮文壇上確立了四家詩人的地位。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在此前並不為朝鮮文壇所熟悉，當時他們都是年輕詩人，地位低下，只是彼此鼓勵，相互往來，但並不為其他人所承認和

<sup>65</sup> 此見於第二鈔本《韓客巾衍集》。因為潘庭筠的跋尾書寫很不清楚，塗抹甚多，只得從略。第一抄本未錄入最後的跋尾，不知何故。

<sup>66</sup> 李調元：《童山文集》，卷五〈薑山集序〉，頁一三下至一四上。

了解。《韓客巾衍集》西傳清朝，得到李調元、潘庭筠的稱頌，四人的詩名馬上在朝鮮傳播開來，《韓客巾衍集》遂為朝鮮詩壇所傳頌。後來此書得以刊行，四家詩名更為朝鮮人普遍接受，在朝鮮詩壇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假若沒有李調元、潘庭筠的評點，四家詩名是否能夠傳開來，還是未知之數。

更為重要的是，這四位詩人中，隨後有三位去過北京，不僅拜見了李調元、潘庭筠，還與其他數十位清朝學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從而開創了中朝學人交往的新階段。他們都成為朝鮮後期堅定的改革派，一反傳統的「尊周派」，主張向清朝學習，以朴齊家為代表，積極宣導北學，成為北學派的主力代表。乾隆四十三年，朴齊家自北京歸來以後，即著《北學議》一書，其書名取自《孟子》中「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之典故而來。書中盛讚中國的文物禮義，大力提倡向中國學習。朴齊家首先批評尊周派的迂腐，指出正是尊周派的拒斥清朝，不向清朝學習，而使得朝鮮落後，以至於國力不振。其論曰：

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與夷，必有分焉，則未聞以夷之猾夏，而並與夏之舊而攘之也。……然而清既有天下百餘年，其子女玉帛之所出，宮室舟車耕種之法，崔、盧、王、謝士大夫之氏族，自在也；冒其人而夷之，並其法而棄之，則大不可也。苟利於民，雖其法之或出於夷，聖人將取之，而況中國之故哉！今清固胡矣。胡知中國之可利，故至於奪而有之。我國以其奪之胡也，而不知所奪之為中國，故自守而不足，此其已然之明驗也。……今也，以中國之法而曰可學也，則群起而笑之。匹夫欲報其讎，見其讎之佩利刃也，則思所以奪之。今也，以堂堂千乘之國，欲伸大義於天下，而不學中國之一法，不交中國之一士，使吾民勞苦而無功，窮餓而自廢，棄百倍之利，而莫之行。吾恐中國之夷未暇攘，而東國之夷未盡變也。故今之人欲攘夷也，莫如先知夷之為誰；欲尊中國也，莫如盡行其法之為逾尊也。若夫為前明復讎雪恥之事，力學中國二十年後，共議之未晚也。<sup>67</sup>

對於尊周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朴齊家的主張得到了朴趾源等開明人士的積極回應，朴趾源在給《北學議》所寫的序中，進而批判朝鮮尊周派人士的偏氣，曰：

吾東之士，得偏氣於一隅之土，足不蹈函夏之地，目未見中州之人，生老病死，不離疆域。則鶴脰烏羽，各守其天；蛙井鷓枝，獨信其地。謂禮寧野，認陋為儉。所謂四民，僅存名目。而至於利用厚生之具，日趨於困窮。此無他，不知學問之道也。如將學問，舍中國而何！然而其言曰：今之主中國

<sup>67</sup> 朴齊家：《北學議》，載《楚亭全書》下冊，外篇〈尊周論〉，頁402-5。

者，夷狄也。恥學焉，並與中國之故常而鄙夷之。彼誠雜發左衽，然其所據之地，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於此土之中者，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遺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況其規模之廣大、心術之精微、製作之宏遠、文章之煥赫，猶存三代以來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以我較彼，固無寸長，而獨以一撮之結，自賢於天下曰：今之中國，非古之中國也。其山川則罪之以腥羶，其人民則辱之以犬羊，其言語則誣之以侏離，並與其中國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則亦將何所仿而行之耶！<sup>68</sup>

朴趾源所言正是當時朝鮮社會的狀況，也是朴齊家、李德懋等所深惡痛絕的。他們趁著前往北京的機會，積極與清人交往，細緻觀察清朝的一草一木，對於當時朝鮮社會的尊周論者給予了猛烈抨擊，大聲疾呼，要向清朝學習。

朴齊家《北學議》內篇，幾乎是從日常所用的車、船、工具、房屋、磚瓦，以至農用、耕種、醫藥等等各個方面都與中國進行比較，從而指出朝鮮的不足。在朴齊家的眼中，朝鮮無一可以與清朝相比，清朝是個理想的國度。「城郭、室廬、車輿、器用」，無一不是朝鮮學習的對象。可以說是十足的「中國化」學派。朴齊家在《北學議》外篇中，指責朝鮮不學中國之過。他認為：

我國既事事不及中國，他姑不必言，其衣食之豐足，最不可當。中國之民，雖荒邨小戶，率皆灰築數間之庫，不用斛包，直輸穀於中，或全庫，或半庫，或環簞於屋中，如大鍾，高接于梁梯而下之。多者可百斛，小者不下二三十斛。往往一室之內，有數堆焉。我國小民之生，皆無朝夕之資。十室之邑，日再食者不能數人。其所謂陰雨之備者，不過葛黍數柄、番椒數十，懸之於蔀屋煙煤之中而已。中國之民率皆服錦繡、寢氈毳，有床有榻。耕夫亦不脫衣，皮鞋束脛，叱牛于田。我國邨野之民歲不得木綿一衣，男女生不見寢具，稿席代衾，養子孫於其中。十歲前後，無冬無夏，裸體而行，更不知天地之間，有鞋襪之制焉者皆是也。……中國無京外之別，其大會，如江南、吳蜀、閩越之遠，而其繁華文物，反勝於皇城。我國都城數里之外，風俗已有邨意。蓋其衣食不足，貨財不通，學問喪於科舉，風氣限於疆域，見聞無由而博，才識無由而開也。若是而已，則人文晦而制度壞，民日眾而國日空。……百藝怠荒，有廢而無修，日有暇而力不足者，何也？不學中國之過也。<sup>69</sup>

<sup>68</sup> 朴趾源：《燕岩集》（漢城：慶熙出版社，1969年），卷一〇〈北學議序〉，頁105-6。

<sup>69</sup> 朴齊家：《北學議》，外篇〈農蠶總論〉，頁389-92。

中國的富足促使朝鮮燕行使行人員反思，這是一種基本的出發點。朴齊家認為朝鮮事事不如中國。開篇即盛稱清朝之富足，這是朝鮮燕行使臣最能切身感受到的。朴趾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往北京、熱河，寫下了著名的《熱河日記》。一踏入清朝國境，就讓他們感到天壤之別，因而用了不少筆墨記錄沿途都市之繁華。因為見到了清朝的富足，從而使得燕行使臣們開始反思所謂的「尊周攘夷」觀。這大概是朝鮮北學派人士的一個共同出發點。朴齊家處處將朝鮮與清朝相比，認為不僅是器物上朝鮮不如清朝，應該向清朝學習，而且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上也應該向清朝學習。他所說的北學應該有豐富的內涵，並非只是「利用厚生」之具，而是一種全方位、徹底的向清朝學習。大體包括幾個方面：(一) 器物方面，即所謂「城郭、室廬、車輿、器用」；(二) 技術方面，築城與建房等方面的技術；(三) 生活方式方面，奢與儉的問題；(四) 思想觀念方面，經商的觀念與士人的地位等等。

當然，將朝鮮北學派的產生歸之於《韓客巾衍集》的西傳，是過高估計了此書西傳的影響。不過，正是《韓客巾衍集》的西傳，並得到清朝學人的讚賞，從而更激發了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的西來，也更加增加了他們去了解 and 學習清朝的興趣，因而此書在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總之，乾隆中期是清代中朝關係的一個轉折時期。在此之前，朝鮮君臣堅信作為夷狄的清朝江山不久，作為中華的明朝遲早會恢復，所以朝鮮始終高舉尊周攘夷的旗號。在外交上，朝鮮履行作為藩國的義務，但是思想文化上則極力拒斥清朝的影響。但是到了乾隆中期，百餘年過去了，清朝不但沒有滅亡，反而國力昌盛，百姓富足，出現了難得的盛世。相反的是，朝鮮因為不向清朝學習，失去了唯一的學習外來先進文化的途徑，變得愈加窮困，各種矛盾更加激化，這樣激起了一批下層士人的反省，在國內尋求改革，在與清朝的交往上也尋求變通。在洪大容主動尋求與清朝學人交往後，終於激發起朝鮮學人向清朝學習。恰在此時，《韓客巾衍集》傳入清朝，竟然得到清朝學人的大力讚賞，於是奠定了朝鮮四家詩人在朝鮮詩壇的地位。他們原本是不為人所知的，因為有了清朝詩人的肯定，他們在國內的地位也就日見提高。其次，開啟了朝鮮詩人李德懋、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與清朝詩人李調元、潘庭筠等人的密切交往，他們書函往來不絕，詩文唱和不斷，成就了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更為重要的是，這批青年學者到了北京，感受到中國之先進與開明，回國以後，以朴齊家為代表，積極呼籲向清朝學習，改革政治，尋求富強，成為朝鮮北學派的主力幹將，從而開啟了一個中朝學人交往的新時期。

# Scholarly Contacts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oson and Qing Scholar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Focusing on the Introduction of *Hanke Jinyan Ji* and Relate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A Summary)

Sun Weiguo

Lyu Geum 柳琴, a retinue officer of the Choson emissary sent to the Qing court in Beijing in 1777, brought along a copy of the *Hanke jinyan ji* 韓客巾衍集, a collection of poems of four young Choson poets compiled by himself, and presented it to Li Tiaoyuan 李調元 and Pan Tingyun 潘庭筠, two eminent Qing poets of that time. They gave high marks to the four poets' achievements and wrote prefaces for the book. This was a very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cultural contac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irstly, these four poets' stature was elevated in Korea because the Qing poets gave them high marks, and they became known as the "Four Poets." Secondly, from then on, Choson poets Lee Deokmu 李德懋, Park Jega 朴齊家, and Lyu Deokong 柳得恭 wrote letters and kept close contacts with Li Tiaoyuan and Pan Tingjun; later, they met with each other in Beijing several times. Thirdly, after they returned to Korea, they advocated that Choson should learn from Qing China and initiate political reform; hence, they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Choson Bukka School.